

毛泽东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

传

崔志海 著

A Biography of Cai Yuanpei

红旗出版社

蔡元培

傳

崔志海
著

A Biography of Cai Yuanpei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元培传 / 崔志海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051-1755-6

I. 蔡… II. 崔… III. 蔡元培 (1868 ~ 1940) 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1244 号

书 名: 蔡 元 培 传

著 者: 崔志海

责任编辑: 刘思慧

责任校对: 刘文芳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 编: 100727

E - mail: hqcbs@publica.bj.cninfo.net

编 辑 部: 64068163

发 行 部: 64037154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1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1755-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录 |

001 少年时代 恂恂学子

私塾的学习生活虽然枯燥，但蔡元培却是一位勤奋好学的恂恂学子。关于他少年时代读书的专心和用功，曾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有一天傍晚，他在自家楼上读书，宅中忽然失火，举家惊惶失措，疾呼他赶快下楼，蔡元培却因读书入神，全然不察。他读书时，还有一个习惯，喜欢边看书边嚼豆，常说炒豆味香，愈嚼读书味愈浓，但案旁之豆一旦吃完，他也不再向家人索取。读书时每遇疑难之处，他便大量翻阅有关参考书，案头上常因此堆满书籍，无暇整理收拾，经常由他的六叔将书放回原处。蔡元培少年时代读书之勤奋，从他晚年在《自写年谱》里提到的挑灯夜读的情景中，亦可见一斑。

- ◎ 一、故乡绍兴 / 002
- ◎ 二、商贾之家 / 005
- ◎ 三、十年私塾教育 / 008
- ◎ 四、六年铸学斋 / 011
- ◎ 五、入仕翰林院 / 015

019 辛亥时期 书生革命

蔡元培作为一名清末翰林，他在走向革命的历程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蔡元培一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但同时也较诸其他革命党人更具有书生色彩。作为革命家，他既不同于孙中山、黄兴等职业革命家，也不同于章太炎，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几乎都以教育机构为据点，既没有深入下层会党，也没有深入新军，至于革命手段则都偏重于暗杀。

- ◎ 一、甲午惊雷 / 020
- ◎ 二、绍兴中西学堂总理 / 025
- ◎ 三、执教南洋公学 / 030
- ◎ 四、提倡女权 / 037
- ◎ 五、投身政治 / 042
- ◎ 六、走向革命 / 047
- ◎ 七、留学德国 / 053

061 民国初年 捍卫共和

蔡元培在民初教育改革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建廉洁、高效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百废待举，教育部更是既无专门经费，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当蔡元培前往南京履任，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询问教育部地点在何处时，孙中山的回答是“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经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相助，允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房屋，教育部的办公地点才告解决。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启用印信，开始办公。

- ◎ 一、返国报效 / 062
- ◎ 二、力行教育改革 / 069
- ◎ 三、拒绝与袁合作 / 077
- ◎ 四、游学法国 / 083

091 五四时期 学界领袖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不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摇篮，而且也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巴黎和会把我国山东主权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北大和高师、中国大学、医专、汇文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高呼和高举“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和标语，汇集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揭开“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 ◎ 一、出任北大校长 / 092
- ◎ 二、在新文化运动中 / 112
- ◎ 三、“五四”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 122
- ◎ 四、坚持走教育救国之路 / 134
- ◎ 五、好人政府与不合作主义 / 139

149 党国元老 功在科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作为老同盟会会员，同时也因他参与1927年的反共清党活动而被奉为党国元老，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然而，蔡元培毕竟是蔡元培，他并没有由此迷恋官场，与国民党的官僚们沆瀣一气，而是始终保持一位学人的本色，把精力主要用在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上。

- ◎ 一、在革命中误入歧途 / 150
- ◎ 二、致力教育事业 / 157
- ◎ 三、主持中央研究院 / 167
- ◎ 四、坚持“五四”传统 / 175

185 晚年忧政 民主抗日

蔡元培十分关心中国内地的抗战，对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更是由衷地高兴。1938年4月间，他在香港与由欧洲返国的老朋友、共产党员吴玉章晤谈时，“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一年后，他在接待来访的陈翰笙时，又激动地称赞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做出杰出贡献的周恩来“了不起”。1938年11月间，叶企孙来香港，告天津理科大学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破坏日军交通，很有效果，但借用清华大学万余元备用公款已用罄，需另筹款项，拟往访宋庆龄，希望他能为之作函介绍。蔡元培听后，当即写了一封“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表示了他对内地抗日活动的积极支持。

- ◎ 一、从迷途中觉醒 / 186
- ◎ 二、保障民权 / 195
- ◎ 三、力主抗日 / 204
- ◎ 四、在最后的岁月里 / 211

219 结 语：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223 附录一 蔡元培生平大事年表

235 附录二 参考书目

239 后 记

少年时代 恂恂学子

私塾的学习生活虽然枯燥，但蔡元培却是一位勤奋好学的恂恂学子。关于他少年时代读书的专心和用功，曾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有一天傍晚，他在自家楼上读书，宅中忽然失火，举家惊惶失措，疾呼他赶快下楼，蔡元培却因读书入神，全然不察。他读书时，还有一个习惯，喜欢边看书边嚼豆，常说炒豆味香，愈嚼读书味愈浓；但案旁之豆一旦吃完，他也不再向家人索取。读书时每遇疑难之处，他便大量翻阅有关参考书，案头上常因此堆满书籍，无暇整理收拾，经常由他的六叔将书放回原处。蔡元培少年时代读书之勤奋，从他晚年在《自写年谱》里提到的挑灯夜读的情景中，亦可见一斑。

[一、故乡绍兴]

[二、商贾之家]

[三、十年私塾教育]

[四、六年铸学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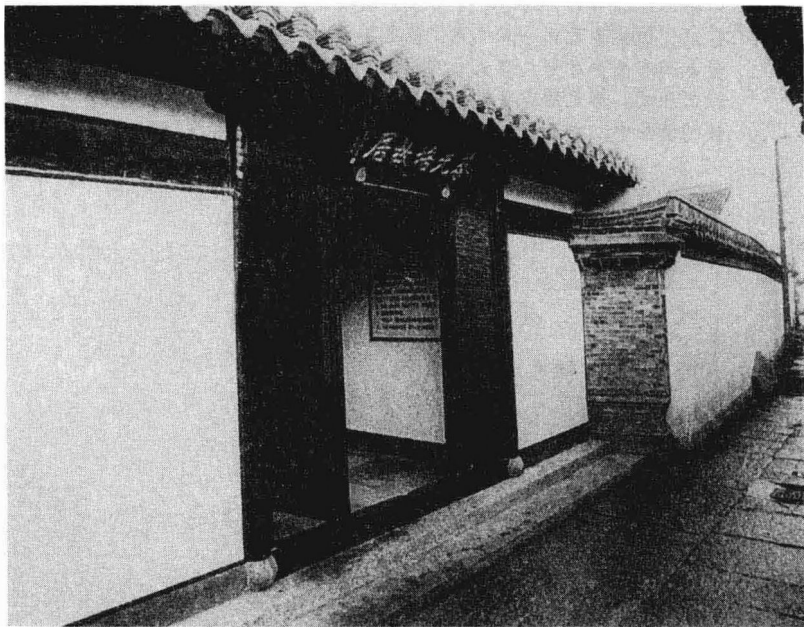
[五、入仕翰林院]

少年时代 恂恂学子

一、故乡绍兴

1868年1月11日夜里11时左右,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笔飞弄内一幢坐北朝南的民宅里。

绍兴位于浙江的东北部,地处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岸,宁(波)绍(兴)平原的西部,属于美丽富饶的浙北平原。它的西南面为丘陵地形,苍茫的会稽山连绵其间,山峦重叠,占去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著名的秦望山、香炉峰、禹陵,就在会稽山的西干山脉伸展而成的秦望山脉的北面。它的东北面是一块近700平方公里的大平原,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它是一处典型的江南水乡,有“水乡泽国”或“东方的威尼斯”之称。绍



▲ 绍兴故居。

兴的自然景观曾令历代文人学士流连忘返,赞美不已。晋人称道它“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大书法家王羲之则写下“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千古佳句。

绍兴不但风景秀丽,而且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绍兴被称为“古荒服之国”。但到了夏朝,大禹治平水土,便被划在“扬州之域”。绍兴的苗山(一作茅山)也改称“会稽山”,地名称“会稽”。至春秋战国时,绍兴为越国的国都,地名称“越地”,亦称“于越”。至汉代,置“会稽郡”。隋朝废郡邑制,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为金兵所迫,于1129年(建炎三年)从杭州渡钱塘江来到越州,驻跸州廨,越州第一次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两年后,也即公元1131年,宋高宗取“绍(承继)祚中兴”之意改换年号,以该年为绍兴元年,并仿“唐幸梁州故事,升州为府,冠以纪元”^[1],把越州改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地名的由来。到元代,绍兴府的名称被废除,改称为“绍兴路”,并统辖山阴、会稽、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诸暨、萧山八县。明清两代,又恢复绍兴府。1912年民国元年废府改县,把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并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上,绍兴素以“文物之邦”著称于世,从于越到晚清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产生过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春秋后期有著名的政治家越王勾践,他领导越国人民“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转弱为强,报仇雪耻,打败吴国,完成复国大业的故事,一直为越人引以自豪。在汉代,绍兴有杰出的水利专家马臻,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和不做统治者帮闲的有骨气的学者严子陵,以及被封建时代称为孝子的董黯和孝女曹娥。魏晋时期,随晋室南迁,绍兴更是成为文人学者的聚会之地,东晋著名文学家谢灵运、孔灵符和大书法家王羲之都曾在此生活。当年,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舍宅戒珠寺离蔡元培的住宅笔飞弄仅咫尺之遥。相传,王羲之住在戴山脚下的戒珠寺养鹅写字,他的书法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劲头来时笔飞墨舞,毛笔常常飞到右面蔡元培家所在的那条巷里,于是,这里便取名笔飞弄。唐朝,绍兴又有著名诗人贺知章和画家孙位。宋代则有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明清两代,更是人才辈出,如书画家和诗人徐渭,画家陈洪绶,散文家张岱,理学家刘宗周,曲律学家王骥德,医学家张景岳,历史学家章学诚,书画家和篆刻艺术家赵之谦,画家任伯年,他们或生于斯,或长于斯。这些越中先贤人物,使绍兴这座古城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古城绍兴也是浙东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早在春秋时期,绍兴即有冶金工业,并以铸剑和铸造铜镜闻名于世。晋代开始绍兴所产的越纸和唐代开始所产的越窑、丝

[1] (宋)陆游《(嘉泰·会稽志)序》。按“唐幸梁州故事”,指公元783年(建中四年)朱泚之变,唐德宗出奔梁州后,于公元784年诏改梁州为兴元府。

绸以及酿造、制茶等业都曾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有“越纸滑如苔”、“越窑如冰”的美称。此外,绍兴物产丰富,每年向各地输出难以计数的粮食、畜产、鱼盐、芡实、莼菜、山货等土特产。长期以来,绍兴在浙江一直是仅次于省城杭州的重要商业城市。南宋士人王十朋在《会稽三赋》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绍兴市容的繁华:“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到了近代,随着宁波和温州海上贸易的发展,绍兴在省内的商业地位虽有所下降,但由于绍兴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是温州、台州、宁波三府各县到杭州的必经之路,在经济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在手工业方面,尽管绍兴所产的越纸和越窑在宋代以后即趋衰落,但制茶业、酿造业以及木刻、砖雕、丝织等民间工艺继续得到发展。特别是酿造业,在近代更是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到清代末叶,据



▲ 绍兴古城风貌。

估计,绍兴每年所酿黄酒多达30万缸,年产量达300万坛之巨。它们不仅销往国内各地,而且漂洋过海,远销南洋、日本等国外市场,有“越酒行天下”之称。

蔡元培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景色如画,商业繁荣,又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城长大的。从出生到1894年赴京做官,蔡元培在绍兴生活27年,加上他后来返乡休假前后约3年,共计30年,占去他一生的十分之四。从青年时代开始,蔡元培就对故乡绍兴的

湖光山色、悠久历史、经济文化充满自豪之感。1895年,他在所作的《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中,对大禹、越王勾践和越中历代大文人推崇备至。其文曰:“岩岩栋山,荡荡庆湖。扬州实镇,南江所都。苕清谷异,世嬗贤谥。经论云雷,实维大禹。服教畏神,礼义之府。后王尝胆,任侠竞趋。气节慷慨,是焉权舆。胜朝致命,遂多伟儒。……”^[1]1903年,蔡元培在向旅沪绍兴人所作的一次演说中,又盛赞越人在实业、文化和政治上所取

[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得的成就,他说:“绍兴之农勤而耐久,一府之中,几无隙地,而浙西江南垦荒之民,绍兴人辄占其一部,南至闽粤,西抵川藏,皆有绍兴人之足迹。酿造之法,冠绝全国焉,是为实业界之势力。自汉以来,儒林、文苑诸传,无不有绍兴人者,而王阳明氏之道学,乃今尚为海外哲学之一派,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骚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数百年来,以吏治国,而吾绍兴人能利用之曰幕友,曰胥吏,此二者在今日既为国人所唾骂为亡国之媒,然其时民权未昌,宪法未立,所谓神圣不可犯者,吏而已矣,因而利用之,是亦天演体合之通例焉,是为政事界之势力。”^[1]1938年,在为《鲁迅全集》出版所写的序言中,蔡元培也自豪地指出,正是绍兴这方水土培育了像王羲之、陆游、鲁迅这样著名的文人学士,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写道:“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2]其实,蔡元培的这段话,用于他本人也是十分合适的。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和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在许多方面反映的也正是越人的精神。

二、商贾之家

有清一代,绍兴作为浙东商业和文化中心,社会阶级结构除下层劳动人民之外,作为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家庭,最普遍的有两类:一类是封建知识分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书香之家;另一类便是商人。蔡元培的家庭即属于后者,为商贾之家。

据《绍兴县志资料》记载,蔡元培的祖先系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由诸暨迁来绍兴城内。初以造林售薪为业,后有一祖先遭同行嫉妒,被斧砍伤,此后便不再经营木材业。到蔡元培的高祖以下,才开始经商。曾祖兄弟四人,或在乡里县城设铺,收购丝绸软缎,或往返于绍兴、广州,从事贩运。其中行三的一位,曾由浙江运绸缎到广州,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罄其所有,营救出狱,家业亦因之中落。到了蔡元培的祖父,因经营典当业有方,又重振家业,不但在城里开了一家当铺,并在笔飞弄买下一幢坐北朝南、大厅三楹的房屋。后以生子众多,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房屋,三代合住,“做成小康的家庭”^[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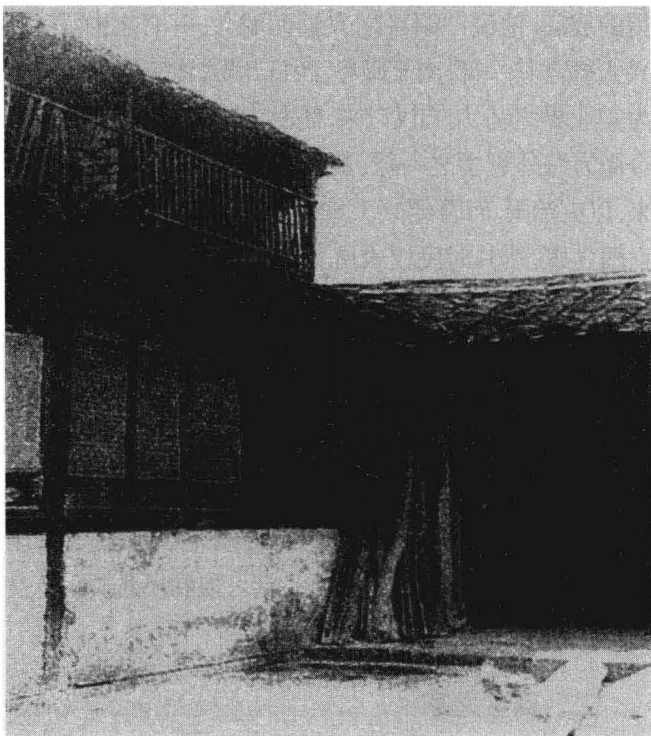
蔡元培的祖父名廷桢,又号嘉谟,字佳木,“行事以公正著”,卒于同治十一年

[1]《全集》第1卷,第170页。

[2]《全集》第7卷,第214页。

[3]《自写年谱》,《全集》第7卷,第269页。

(1872),共生七子。长子便是蔡元培的父亲蔡宝煜,又名光普,字耀山。在兄弟七人中,除老三习武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外,全家以经商为业。蔡元培的父亲为钱庄经理,老二经营绸缎业,老四、老五、老七也都在钱庄任职,只有老六铭恩读书,考试入学,为廪生,成为蔡元培父辈中唯一一个读书登科之人。蔡元培早年读书,即曾多得他的指导。蔡元培在《口述传略》中自述说:“子民有叔父,名铭恩,字茗珊,以廪膳生乡试中式。工制



▲ 蔡元培出生地——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9号老宅。

艺,门下颇盛。亦治诗古文辞,藏书亦不少。子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指导焉。”^[1]后来,蔡元培在己丑年乡试《齿录》的“受业师”项下列在第一位的便是“叔父岷山夫子”。

蔡元培的父亲光普先生虽为钱庄经理,但并不嗜钱如命,染上铜臭,反而待人宽厚,慷慨大度,周济朋友,有求必应,甚至借款予人,也不忍索还,以致去世后,家中毫无积蓄。据说,光普先生便是由于他任钱庄经理时,某年因获利颇丰,给店伙多发奖金,遭东家不满,并责令赔偿,因此忧悒而歿。光普先生病逝后,生前向他借贷的友人虽无借条,却都主动来还,说是良心上不能负好人。光普先生的一位好友在挽联中称赞道:“若要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2]

1877年光普先生去世时,蔡元培年仅11岁,家道也因之再度衰败。蔡元培晚年在《自写年谱》中这样回忆道:“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于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同住一街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我那

[1]《全集》第3卷,第319页。

[2]《全集》第7卷,第270页。

时候年纪虽小,但是听我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引起感想,所以至今还没有忘掉。”^[1]

蔡元培的母亲周太夫人,虽无多少文化,却贤惠能干,且颇有志气。光普先生病故后,周太夫人靠典衣质饰,省吃俭用,抚养诸子成人。一些亲友见元培兄弟孤苦无依,提议募款接济,周太夫人婉言谢绝,不愿受人施舍。她常勉励孩子们要“自立”、“不依赖”,对孩子们管教甚严。蔡元培回忆说:“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致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2]夜里,孩子们做功课,周太夫人则在一旁陪读,温语安慰、勉励。一次,蔡元培功课做得太晚,过于困倦,思路也打不开,周太夫人便劝他索性早睡,第二天黎明再将他叫醒。结果,经过一夜的休息,蔡元培精神恢复,思路豁然开朗,一挥而就。从此之后,他便养成了熬夜不如早睡的习惯。

母亲对蔡元培的影响最大,蔡元培也最爱他的母亲。1885年,蔡元培17岁那年,周太夫人胃病加剧,服药亦不见效,蔡元培听说割臂肉和药,可延寿十二年,他便瞒着家人,偷偷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小片肉,为母和药。第二年,周太夫人病故,蔡元培悲痛万分,必欲行寝苦枕块之制。被家人劝阻后,他又于夜深人静之际,挟枕席赴棺侧而睡,其兄弟闻之,知不可阻,便设床于停棺之堂,兄弟共宿。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时改从母姓,取名周子余,以表示对他母亲的怀念。在《自写年谱》中谈到早年家世时,蔡元培更多的也是提到母亲的养育之恩和影响。他深情地说:“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3]

蔡元培有同胞兄弟四人,姊妹三人,他在家中居二。兄元钊,字鉴清,长期在上海崇实石印局任职。弟元坚,字镜清,后在绍兴钱庄业中任职。四弟及幼妹早殇,姊两人均未嫁即病逝。据蔡元培本人说,他的父亲面方,皮肤黄;母亲面椭圆,皮肤白。他兄弟

[1] 《全集》第7卷,第270页。

[2] 同上书,第275页。

[3] 同上。

姊妹七人,行单的都像母亲,行双的则都像父亲。他行二,所以长相像父亲。

蔡元培的家庭虽为商贾世家,但并非富商巨贾,而是属于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的一般商人之家。蔡元培后来表现出来的安详方正、平易待人的性格,应该说多少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关。蔡元培本人即自谓他性格上的宽厚,得自父亲;不苟取,不妄言,得诸母教^[1]。

三、十年私塾教育

据说明清之际,在绍兴有钱人家中盛行着这样一种习俗:凡是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往往一个习商或经营家产,另一个则送去读书深造,以冀家中有人在仕途上光耀门庭,同时也为守护和扩大家产找个政治靠山。光普先生在世时,蔡元培的家庭在绍兴也算是有钱的“小康”人家。在家中,光普夫妇选择了蔡元培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培养对象,在他虚龄6岁那年,便请了一位姓周的老师到家设塾授教^[2]。

从塾师那里,蔡元培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在幼童时期,他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和《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等书。在读这些书时,周先生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大多似懂非懂,但读的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得出来。对于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蔡元培后来进行过严厉的抨击。他说:“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是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只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3]

除读书外,蔡元培还跟周先生识字、习字、学做对句。周先生教识字的方法与现代的儿童教育所采用的差不多,既教读法、字形,也讲字义。习字则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用帖子放在面前,在别的空白纸

[1]《全集》第3卷,第319页。

[2]林文铮:《蔡子民先生二三事》,《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3]《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全集》第3卷,第173~174页。

上照写。对句则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在对句时，不但要求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来对，如先生出一“山”字，学生就要以“海”字或“水”字来对。又如先生出“桃红”两字，学生便要第一字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用颜色的形容词来对，比如“柳绿”或“薇紫”等。此外，在对句时还兼习四声的分别，要求平声字对平声字，仄声字对仄声字，而且在仄声字中还要掌握上、去、入的区别。这种严格的语文训练，既为作文也为作诗打下了基础，不失为提高国文水平的一种办法。

蔡元培在家跟周先生读了5年，到11岁那年，也即1877年，因父亲病故，家里无力再聘塾师，于是年下半年寄居姨母家附读。第二年再转到自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就读。这位李先生教法更呆板、严厉。每日上新书一课，先自己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再让学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复读，直至能背诵为止。课后各学生要回家温习。第二天上课前，李先生令学生把所读的书统统送到他的桌上，背他而立，他从课文中随意撮取一句，叫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背诵，或有错误，便责打手心十下，第二次再不会就责打二十下，每次加倍。蔡元培有一次就因背诵《易经》屡犯错误，被责打手心达百下。自1879年起，蔡元培还从李申甫先生学做八股文。八股文的做法是先做破题，再做承题，然后做起讲，最后做全篇，由简而繁。就此来说，八股文也不失为一种学习写文章的方法。然而，那时候做习题时仍有破题，做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做全篇时也还有破题、承题、起讲，这种规矩就违背了写文章的正确方法，诚若蔡元培后来批评的，“实在是重床叠架了”^[1]。

大概是因为这位李申甫先生的教学方式过于呆板、严厉，蔡元培在他那里读了两年，到1880年便转到离家半里之遥的王懋修夫子处就读。这位王老夫子虽只中过秀才，但却是个博学通经、熟谙明清两朝八股文的人，在当时的绍兴颇有点名气，到他门下就读的学生不下三十人，且其中还有远道而来住宿就读的。王老夫子在教学内容上与其他塾师并无差别，但态度却比一般的塾师负责、耐心。他本人兴趣广泛，看书随意，不仅好碑帖，看《金石萃编》等书，而且也读《西厢记》这类所谓的“淫书”。但为了使学生们将来能入学，金榜题名，他对学生们读什么书却管得很严，除经书之外，其他书一律不许看。有一回，蔡元培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三国志演义》，刚看了几页，王先生发现后便说：“看不得，陈寿的《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又有一次，蔡元培借到一本《战国策》，王老夫子看见

[1]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全集》第7卷，第194页。

后,又说看不得,指出秀才的入学考试,作文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将《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用进去,考试时必为考官所不取^[1]。在教做八股文时,王老夫子发现蔡元培有写得不对的地方,并不训斥,也不立即在卷子上改写,而是耐心地指出错误所在,让蔡元培回去改写。

除学业外,王懋修先生在思想道德方面也予蔡元培不小的影响。王老夫子不只是八股名家,而且也深谙宋明理学,常向学生讲述山阴明儒刘宗周的故事。刘宗周系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老师,为人刚毅正直,因不满当朝权奸魏忠贤而遭排挤。回到绍兴后,在戴山脚下创建戴山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人称“戴山先生”。后来,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王先生十分景仰刘宗周,便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仰戴山房”。此外,王老夫子还向学生讲述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今桐乡)人,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学者。明朝灭亡后,他散发家财结客,图谋复明。事败后,他誓死不仕清朝,家居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曾静(1679~1736),湖南永兴人,号蒲潭先生,读吕留良遗著,受其思想影响,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政府逮捕杀害。而早已去世半个世纪的吕留良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剖棺戮尸,焚毁著作”,子孙或被杀,或被发配边疆,成为清代一件大案。这些明末清初志士的反清故事,使蔡元培在少年时代受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蔡元培自谓“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便与王懋修的影响分不开。总之,王懋修是蔡元培私塾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先生。1896年,蔡元培在《展先师王子庄生墓记》中就写道:“培从事四年,所以策励之者尤挚。”^[2]晚年,他在《自写年谱》中又说:“我自十四年(岁)至十七年(岁),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3]

私塾的学习生活虽然枯燥,但蔡元培却是一位勤奋好学的恂恂学子。关于他少年时代读书的专心和用功,曾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有一天傍晚,他在自家楼上读书,宅中忽然失火,举家惊惶失措,疾呼他赶快下楼,蔡元培却因读书入神,全然不察。他读书时,还有一个习惯,喜欢边看书边嚼豆,常说炒豆味香,愈嚼读书味愈浓;但案旁之豆一旦吃完,他也不再向家人索取。读书时每遇疑难之处,他便大量翻阅有关参考书,案头上常因此堆满书籍,无暇整理收拾,经常由他的六叔将书放回原

[1] 见《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全集》第6卷,第548页。

[2] 《全集》第1卷,第60页。

[3] 《全集》第7卷,第272页。

处^[1]。蔡元培少年时代读书之勤奋,从他晚年在《自写年谱》里提到的挑灯夜读的情景中,亦可见一斑。

经多年苦读,1883年蔡元培终于在是年由提学使(旧称提学道)主持的道考中考中秀才。考官对他考卷的评语分别是:“笔轻而灵,意曲而达”,“论尤警当,与众不同,诗亦有动目句”,“简洁名贵,滴滴归原”^[2]。评价甚高。考中秀才后,蔡元培就不再到王懋修先生处就读,结束了他少年时代的私塾学习。

从1872年虚龄6岁那年聘请塾师教读,到1883年17岁那年考取秀才,蔡元培接受私塾教育前后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蔡元培所学的主要是些应付科举考试的内容:识古字,读儒家经典,学做八股文。但这十年毕竟是蔡元培接受教育的开始,为他进一步求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十年旧式私塾教育,使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利弊有了深切的体会,这对他后来从事教育改革不无裨益。

四、六年铸学斋

考中秀才,根据当时清朝的制度,也就获得了进入官立学校深造的机会。但蔡元培在考中秀才后并没有进学校深造,却拿起教鞭,当起塾师。在1884~1885年的两年里,先后在姚家和单家执教。

蔡元培当时没有去学校深造而充任塾师,这很可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自从光普先生病故后,蔡元培的家境即趋衰败。到他考中秀才时,他母亲的胃病又愈益严重,延医吃药,少不了花钱。1936年蔡元培在回忆自己青年时代读书生活时,就提到那时因经济困难,无钱购书的情形。在当塾师的两年里,蔡元培一面靠教书挣来的微薄束脩贴补家用,一面借阅六叔家的藏书,继续自学。所读的书有《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并学作散文和骈文。

1886年,经戊子科举人田宝琪(字春农)夫子的介绍,蔡元培结束两年的教师生涯,到同乡徐友兰家当陪读,并帮助校勘所刻藏书。徐友兰及其兄徐树兰是当时浙东有名的藏书家,家中收藏的图书及碑版异常丰富,藏书多达四万余卷,集中在一幢三层朝东的侧楼里,取名曰“徐氏铸学斋”。铸学斋坐落在绍兴城内的水澄巷,离蔡元培住的笔飞弄只有一里之遥。蔡元培能到徐家陪读并帮助校书,这无疑是他一生中十分

[1] 陶英惠编:《蔡元培年谱》(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第6~7页。

[2]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难得的机遇,为他求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蔡元培十分感谢田春农夫子的介绍,在己丑年乡试《齿录》的“问业师”项下,列在第一位的便是“田春农夫子”。晚年,他又在《自写年谱》中称田春农“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1]。

在徐家,由于没有学校老师的监督,蔡元培可以自由地读书,不受任何学术门户之见所囿,形成泛览百家、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他所涉猎的古籍,范围很广,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大戴礼记》等儒家经典外,还广泛阅读训诂、考据、词章、史学等方面的书籍,时而也浏览医书、算学。就读书兴趣而言,他在治经史中更偏向于训诂;在读史中更偏重于儒林文苑的志传和有关文化风俗的记载,对战争史、政治史及典章名物无太大兴趣;在词章之学中,兴趣偏于散文,对骈文及诗词不太热心。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蔡元培所做的八股文打破传统旧规,受龚自珍文章的影响,为文奇古博雅,常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表现出深厚的文字功底,并因此在士人中闻名。当时山阴龙山书院院长钱篋仙(振常)和会稽稽山书院院长王止轩(继香),对蔡元培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八股文就极为欣赏。后来与蔡元培关系密切的吴稚晖最初也是因他的怪八股得知蔡元培其人。吴在《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一文中回忆道:“当余尚未知有汪洋大盗孙汶,前五六年时,却知有蔡元培者。浙江闾里中有三篇怪八股,能得风气之先,意其人或一怪诞诉弛之士,不知当时彼乃二十三岁之恂恂儒者。”并认为蔡元培所作的怪八股,多用周秦子书典故,为读书人吐气,打倒高头讲章,“是亦所谓新文化运动,抛一香烟罐粗制之炸弹也。”^[2]

据蔡元培本人所说,在他自由读书期间,得益最大、所受影响最深的是训诂学家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名学者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蔡元培认为,在治《说文》的清代学者中,只有朱氏从解经方面尽力,其采用的方法,不但可以纠正唐代李阳冰、宋代王安石等只知会意而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对汉代学者许慎采用阴阳家说法对天干地支及数目所作的解释,也予以合理的更正。另外,《说文通训定声》检阅也最方便。后来,蔡元培回忆自己青年时代这段读书生活时,即自谓:“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3]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在该书中,章学诚不但对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文风予以抨击,而且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在

[1] 《全集》第7卷,第276页。

[2]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90页。

[3] 《全集》第6卷,第549页。